



“第三届中国抗战大后方 研究高端论坛”综述

近年来,随着抗战研究视野的日益扩大,大后方抗战历史越来越受到重视。2018年10月26—28日,由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和《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主办,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承办的“第三届中国大后方研究高端论坛”在广西桂林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的准备工作历时一年,为确保质量,会议主办方对论文进行了严格筛选,同时,为扩大影响,特邀请9名中国台湾学者以及部分日本、澳大利亚学生参会,参加本次会议的代表共66人,提交论文50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在开幕式上指出:与前两届论坛相比,本次论坛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研究队伍年轻化,显示出抗战大后方历史研究的活力有所增强;二是合作研究的方式更加灵活有效,尤其是多位中国台湾学者积极参与,对活跃学术氛围,增强抗战共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共享史料,共写史书”的指示,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本次论坛中,与会专家学者对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外交、抗战大后方的历史地位等多个专题进行了研讨。

一、政治外交问题

国共关系及国共两党基层政治建设,一直是关乎抗战前途的关键性因素,本次论坛中学者们仍对此密切关注。此外,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外交政策和外交困局是本次论坛关于外交问题的主要研究对象。

四川大学陈默在《“弱稳定”中的两党关系:1940年国共之间缓和局面的形成和破裂》中,以1940年国共合作与斗争的史实为重点,考察两党关系,认为这种关系属于“弱稳定”状态,即短暂平衡却难以持久,呈现出一条“弱稳定—失稳—摩擦—修复—弱稳定”的循环曲线。这条曲线自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开始,延伸至战后1946年11月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方才结束。

临沂大学孔繁金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之初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全面论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山东党组织对国民党将领、地方实力派、民团等群众武装力量所进行的统战工作。西安邮电大学袁文伟与张迎弟在《抗战时期中共对秘密社会的动员策略》中,探讨了中共积极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采取一系列方针政策争取和改造哥老会与青帮共同抗日,扩大抗日力量的过程。内蒙古工业大学张荣杰在《华北抗日根据地“交发合一”述论》中指出,中共在华北根据地施行了交

通、邮政、发行合为一体的“交发合一”政策,确保了根据地新闻舆论和主流意识传播的安全,发挥了报刊的舆论引导和宣传教育作用。而且,“交发合一”为1949年后实施的“邮发合一”模式奠定了基础。

玉林师范学院朱凤林、曾凡贞在《国联防疫队与抗战初期广西的防疫》中呈现了国联防疫队在广西与卫生部门、医药机关合作开展的疫病防治活动及其对战时广西防疫的影响。西安医学院张雨新在《卫生下乡:现代国家与基层社会对接的路径选择》中考察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卫生运动,分析中共在局部执政时期所探寻的国家与基层社会对接的路径。

南开大学江沛在《“四不”主张的背后:张季鸾、〈大公报〉与民国政治的纠缠(1928—1941)》中指出,《大公报》负责人与国民党政权有着密切联系,国民党宣传部门为《大公报》提供诸多信息、物质资源,助其逐步获得舆论权威地位,并不要其赤膊上阵为其呐喊,而是要其保持民间风格以利于政治理念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国民。同时《大公报》借助政治力量的成长扩大其影响力,体现了中国政治社会的特性,以及媒体与政治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西南大学陈志刚《1933年日本退出国联与中国外交十字路口的抉择——基于知识界省思的考察》一文,以1933年日本退出国联后知识界对中国外交的阶段性反思为对象,考察他们观点的异同及产生分歧的原因。

本次论坛,关于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学者的关注点更为具体、细微,对政治基础建设的探索,视野更为开阔。关于外交方面的成果虽然相对较少,但较既往研究有了突破,关注视点不仅限于政策制定,还着眼于社会群体层面的反思。

二、经济问题

大后方的主要任务是为抗战提供强大的支撑力量。本次论坛关于大后方经济建设的成果相对较多。

华中师范大学冯国林在《国民政府战时预算管理制度及其运行实效(1937—1945)》中认为,战时国民政府的战时预算制度,在规约政府及财政监督方面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与现代预算制度尚有不小距离。华中师范大学郭本意的《大小券问题的“蝴蝶效应”——抗战时期国民党辅币体系的崩坏》一文,探究了全面抗战时期大小券出现的原因、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国民党的应对策略,及其与国民党辅币体系崩溃之间的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刘超建的《抗战时期广西粮食增产技术措施、扩散环境与空间分异》,着重对《广西省粮食增产实施计划纲要》实施的背景、措施、成效等进行分析,认为该纲要对粮食增产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广西师范大学唐凌在《抗战时期农业推广中的两种力量——以杂粮增产为考察重点》中探讨了抗战时期农产促进委员会因战争粮食资源紧缺,采取推广旱地农作物优化品种以及相关种植技术的范围、策略、方式、成效,同时对其与战时“农都”的关系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指出政府力量和科技力量两者在当时农业推广系统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张旭杨、韦国友《政府力量主导下的战后广西重建及其困境——以广西工业善后救济为例的分析》一文,以战后工业的善后救济为视角,探讨广西省政府主导下“再造新广西”重建工作的成效与困境,评析了战后复杂多变的广西社会及其成因。

上海师范大学陈礼茂的《四联总处与战时大后方金融网》梳理了抗战时期四联总处设立大后方金融网的经过与措施,指出这对改善金融格局、支持抗战,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其存续因战争结束而未能长久。

内蒙古师范大学丁晓杰在《二战前日本的畜产扩张活动研究——以绵羊改良为中心》中,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其本土、殖民地朝鲜、中国东北、华北以及内蒙古等地实施畜产扩张的活动,证明这种扩张与战争存在紧密联系。

云南师范大学张永帅在《时局与环境:时空交织视角下的抗战时期开发云南水运的设想与实践研究》中,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云南省政府试图开发云南水运,以完善云南的战时交通网络,这一计划因云南地理环境的制约未能奏效。从“时间”和“空间”视角认识这一工作,对研究政府在抗战中的作用有新的启发。

本次论坛所涉及的抗战大后方经济问题研究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注重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的构成及其在经济建设中作用的考察;二是注重大后方各省区建设重点及其成效的评析;三是注重建设计划与实践过程的历史检验。这显示出大后方经济建设的研究越来越注重将定量与定性方法结合起来。

三、军事问题

军事问题的研究,过去已取得不少成果。本次论坛,大陆和台湾的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西南大学吴光会、潘洵在《抗战大后方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大惨案的时空分布考察》中提出,日军无差别大轰炸时间集中在抗战相持阶段,1940年达到最高峰。夏季是惨案的高发期,地点集中在四川、重庆战略核心地区;水路、铁路和公路等交通干线所在区域是重灾区;县级及其以上城市损失惨重。文章通过分析数据,指出这种时空分布格局彰显了侵华日军企图通过制造重大惨案,造成恐怖气氛,以达到动摇抗战大后方民众意志,迫使国民政府妥协屈服,实现占领和殖民中国的目的。西南大学郭兰的《抗战时期日军对贵州的无差别轰炸研究》论述了抗战时期日军轰炸贵州造成的损失、原因及其特点,以及轰炸后政府所采取的救济措施。

台湾中正大学杨维真在《抗战时期云南对中国远征军的支援》一文中探讨远征军高层与云南当局的关系,以及云南省政府及社会各界对中国远征军的支持。台湾政治大学杨善尧的《抗战时期国军的战场卫勤运送与支援》,以抗战时期国军在战场上的卫生勤务与运输支援等为研究对象,对相关的制度建设进行了探讨。西北师范大学毛光远的《抗战时期国民党部队军马补充问题研究》,论述了国民党部队军马补充机制演进的过程及其局限性。台湾宏国科技大学陈英杰的《从〈中央日报〉看抗战后期的青年从军运动》,依据《中央日报》报道的文本,结合日记与档案,探究自1943年冬至抗战胜利期间,有关《中央日报》为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所发表的文章内容及其影响。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特邀研究员唐学锋的《中国空军参与桂南会战若干问题研究》,从作战计划、主要战斗过程等方面,探讨了中国空军(包括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在桂南会战中的作用。

本次论坛,围绕军事问题,无差别轰炸是研讨的重点。学者们的研究,更注重史实的考辨,力求准确还原历史的真相,揭示日军的残暴罪行。而对大后方的军事支持及军事行动,则开辟出一些新的领域。

四、思想文化问题

抗战爆发,给中国文化带来巨大冲击,中国的文化事业的主题和内容有了巨大的转变。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艾智科、张肖静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新音乐创作及其取向》中提到,抗战时期大后方的音乐创作取向为反法西斯主义,同时中国新音乐与战时客观条件结合,更加趋于民族化。

西南大学汤斯惟、潘洵在《战时首都重庆音乐书刊文献整理与探究》中,系统搜集和整理抗战时期的音乐书刊文献,并对其中 151 本书籍文献的作者、题材和内容,以及 7 种主要音乐期刊的创办、作者群、主要内容及特点、关注重点等做了考察。由此,文章勾勒出抗战时期中国音乐,特别是战时首都重庆的音乐脉络及走向,阐释了其在中国音乐史的地位及作用。

西南大学张武军在《十四年抗战史观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阐述框架新议》中提出,“十四年抗战史观”意味着对抗战文学的历史谱系重构,对抗战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重新探究,这需要重新思考和调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阐述框架。

战时大后方出现了一个新的理论学派战国策派。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建华在《抗战大后方战国策派学人文化观探讨》中梳理了该学派的主要观点,并对其做出评价。

本次论坛关于文化思想研究所呈现出的特点,一方面是加强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另一方面,是依据“十四年抗战史观”,思考中国现代文学史理论的重构。尽管具体方案尚未正式形成,但为今后的探索提示了方向。

五、社会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心态、普通民众与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状态成为本次论坛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

西南大学郭川、蒋娜在《重庆大轰炸下的抗战大后方民众心态》中,选择时人日记研究大轰炸下的民众心态变化。西南大学蒋娜的《巴金的大轰炸书写及心态变化》,依据巴金的“抗战三部曲”和其他文学作品中关于大轰炸的书写,分析他在抗战不同时期的心态变化。玉林师范学院程刚在《战火与焰火:战时首都重庆春节史事钩沉》中呈现了抗战时期普通民众过春节的状态。台湾中原大学柯惠铃在《战争中的武汉大学校园文化:杨静远〈让庐日记〉的解读》中通过对学者杨静远日记的解读,呈现武汉大学在战争中的政策及校园活动,透析校风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揭示战时知识分子的心态。

台湾中原大学皮国立的《中日战争时毒气知识与后方民众的日常应对》研究了大后方普通民众如何在有限的资源和装备中应对日军的毒气攻击,认为媒体对于毒气防护的相关报导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西南大学赵国壮在《私立大学的国家化:战时后方私立大学的生活样态及生存逻辑》中,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 1938—1946 年的办学状态与生存策略为研究对象,透析了战时后方私立大学的生存逻辑。台湾辅仁大学林桶法的《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抗战时期的王云五》,通过梳理王云五在抗战时期带领商务印书馆走出困局的史实,分析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及出版业面对的困境。该文同时论述了王云五参与国民参政会及担任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等职务的缘由。南京师范大学严海建的《战争的慢性消耗:抗战时期大后方知识人的病痛与死难》,通过时人日记、书信、回忆及传记等资料,详细记录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知识人的病痛和死难情况,论述了战争对于大后方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影响。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社会心态史是近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本次论坛显示,学者们所利用的资料,许多来自时人日记、经历者回忆录及报刊,从而使展现出的历史更真实,也更多样化。另外,学者个案研究和群体研究的结合,对视角的不同选择,增强了历史的表现力。

六、学术史与理论问题

南京师范大学叶铭在《新世纪以来台湾地区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中对近 15 年来台湾地区抗

日战争史研究进行了综述,总结了台湾学者对于抗战史研究的优点与不足。

长安大学冯峰的《农民民族主义——一种关于抗日根据地发展的理论》,通过研究查默斯·约翰逊著作《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权力》的学术背景、主要内容及批评意见,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充分动员了农民的爱国情绪,从而获得了农民的支持。

西北师范大学尚季芳在《论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中提到,当今学术界对西北大后方抗战地位的研究不足。他认为,应从西北抗战大后方是抗战理论的产生地、西北国际援华通道是支援国内抗战的重要生命线、西北抗战大后方是鼓舞中国抗战的精神源泉、西北抗战大后方捍卫了中国国家领土完整等方面,深化对西北抗战大后方地位与作用的研究。

理论、方法与观念更新是实现研究创新的前提。本次论坛,通过对台湾地区和西北地区抗战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同时,通过对国外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推介,开阔了学者们的视野,引发了一些新的思考,也促进了合作。

本次论坛达成了一些学术共识。这些共识,既是对本次论坛存在的不足的省视,也是对未来研究工作的期望。首先,抗战研究不能自说自话,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应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与时俱进,积极了解国外抗战研究动态。不能局限于“革命史范式”,要从多角度研究抗日战争,努力展现抗战的整体面貌。不仅研究中国的抗战,也应关注外方如何看待中国抗战。其次,今后应进一步整合资源,构建共享文献资料的数据平台,组成联盟,进行合作研究。第三,应加强运用各种形式的史料。时人日记、部门档案、民间碑刻等资料在未来应是研究热点。同时应加强日文和其他语种文献资料的研究与运用。第四,学术研究应为现实服务。让研究成果在现实能够发挥功用,尤其是对抗战遗址的保护与利用,要不断提升水平。第五,应关注西南大后方人民在抗战时期所做出的国际贡献,重视西北地区抗战史的研究,形成并强化大后方研究的整体力量。第六,应加强跨学科研究,避免碎片化现象出现。

[作者唐凌,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黄佳,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马晓娟)